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研究

——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景晓芬¹, 马凤鸣²

-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村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 利用2010年“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收集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除了个体的能动性如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影响其留城意愿外, 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一定的空间效应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 另外, 性别因素也会导致其留城意愿的差异, 文化方面的适应也会极大地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关键词: 农民工; 生命历程; 返乡; 留城意愿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3-0057-08

Th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Preference of Staying in Cities or Returning Hom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Theor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hongqi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JING Xiao-fen¹, MA Feng-ming²

- (1.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Society,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Chongqing and Pearl River Delta area by the issue group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migrant workers' desire to stay in cities or return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The study found that effect of birth group, family life cycle and spatial affect the migrant workers' preference to stay in cities or return home besides education and income. Furthermor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nd culture also ha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desire to stay in citie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life course; return home; desire to stay in city

收稿日期: 2012-01-05; 修订日期: 2012-03-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C840004);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1H03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专项。

作者简介: 景晓芬(1975-), 女, 山西运城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聚集于城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乡村的外来人口,我国尚没有完全消除的城乡二元制度和政策残留,使得这部分人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都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使得农民工在面临留城还是返乡问题时非常纠结,他们的留城意愿及留城意愿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外来人口的个体特征来分析导致其不同留城意愿的原因。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年龄等对留城意愿都有一定影响^[1]。但也有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农民工的定居城市意愿影响不明显,职业状况、收入和住房情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有显著影响^[2]。②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状态对留城意愿也会有影响,如在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在城市工作的稳定程度越高者越倾向于留居城市^[3]。自我雇佣者、与本地居民交往较多的农民工留居意愿比较强^[4]。③蔡禾认为,农民工的主观心理因素如对城市的适应、感受到的压力以及感受到的歧视等都会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造成影响^[5]。④还有研究从农村生活的角度如流出地的贫困程度、对待土地的态度等来分析农民工的留城意愿^[6-7]。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研究者都发现了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有的研究表明,年龄对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无显著影响。造成这种年龄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不确定性的原因,一方面跟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有关,另一方面是这些研究大都只将年龄作为一个个体层次的因素加以考虑,至于跟年龄有关的社会时代、个人重要生命事件的发生情况及家庭所处的生命阶段等因素则没有被考虑。从个人或家庭的生命周期来看,虽然大多数人都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轨迹,如每个人都会经历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育、子女受教育等一系列的生命事件,但具体到每个个体,他们在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却可能是有差异的,个体总是处于个人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的共同影响之下。因此,在研究农民工留城意愿时加入生命历程的视角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是近些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对生命历程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学者埃尔德(Elder),他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8]，“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9]，“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10]。埃尔德的这三句话基本上阐明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四个原理：一是生命的时间性原理，这一原理关注某一事件在何时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事件发生的时间比事件本身可能更具有重要的意义^[11]，例如，生育是几乎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生命事件，但这一事件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对个体甚至对其家庭来讲意义都是大不相同的。二是及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人们在哪一年出生和人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联系起来”^[12]，另外，这一原理还包含了人的出生地、工作地等因素，也就是空间效应。三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这一原理认为，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尤其是与其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的影响，例如，父母的生活轨迹会影响子女的成长经历，子女的情况也常常会影响到父母的决策。四是个人能动性原理，指的是个人并不是被动地受社会结构的控制，个人的特征和努力对个体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生命历程诸要素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调查数据，尝试从生命历程视角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探讨，分析究竟什么样的生命或生活事件会对其留城意愿造成影响。

二、数据来源、变量界定及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7月份分别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跨区（县）流动、大专及以下学历、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拦截方法在重庆主城区（沙坪坝、渝中、

江北、巴南、南岸、北碚、渝北、九龙坡)和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各访问了450个农民工,回收有效问卷820份,其中重庆413份,珠三角地区407份,问卷有效率为91.1%。

2. 因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本研究要考察的因变量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在调查问卷中,问题“你将来愿意定居在哪里”,选项分别为“①农村;②老家县城(镇);③打工城市;④其他城市”。农民工的留居意愿如表1所示:倾向于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比例占到大约一半(50.12%),倾向于回流的也有大约一半(49.88%),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流并不意味着他们再次返回农村、返回农业,大部分计划返乡的农民工希望返回他们比较熟悉的环境从事非农产业。计划返回的农民工中有61.79%的人希望能在县城定居,这说明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工从意愿上来讲,希望重新回农村生活的人比较少,但由于定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或现实的融入障碍的存在,使得他们又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相对来讲,老家县城对于他们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而又可以实现的选择。这里既有农村不能相比的各方面的便利,同时文化生活方面又比较熟悉,而且可以保持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模型时,将定居城市和老家县城的定为“0”,视为有回乡意愿;定居打工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定为“1”,视为具有留城意愿。

表1 农民工定居意愿

| 定居意愿 | 频数(个) | 比例(%) |
|------|-------|--------|
| 农村 | 154 | 19.06 |
| 老家县城 | 249 | 30.82 |
| 打工城市 | 287 | 35.52 |
| 其他城市 | 118 | 14.60 |
| 合计 | 808 | 100.00 |

3. 自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本文主要探讨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因而自变量为生命历程,生命历程变量可以具体操作化为以下几类。

(1) 用来衡量“生命的时间性”(timing,包蕾萍将其译为恰当时间)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外出打工时年龄;②外出打工时的婚姻状况,也就是说调查对象是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打工。

(2) 用来衡量“个人的能动性”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教育程度;②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③收入;④个体是否具有务农经历。

(3) 用来衡量“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出生组效应:用个体的出生年来衡量,出生组效应反映的是个体所处的时代,出生组的赋值方法为1=1964年以前,2=1965~1969年,3=1970~1974年,4=1975~1979年,5=1980~1984年,6=1985~1989年,7=1990年以后;②个体时间,用个人的年龄来衡量;③是否省内务工;④打工地:本次调查是在重庆市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四个城市做的,因而打工地为这五个城市;⑤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4) 用来衡量“相互联系的生活”这一原理的变量。具体包括:①是否有子女;②配偶是否一同外出;③子女是否在打工地上学;④直系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在家务农。

变量的具体情况见表2。

4.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探讨个体生命历程对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需要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个体特征加以控制,控制变量包括:①性别,许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留城意愿上要普遍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男性养家人角色使得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经济和生活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所感受到的城市生活压力更大,因而其留城意愿不如女性那么高。②对当地话的熟悉程度,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区分文化的标志,在南方语言体系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熟悉当地语言,意味着调查对象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文化,这可能会导致其留在当地的意愿要强一些,因此,需要对这一变量加以控制。

表2 自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 项目 | 变量说明 | 频数 (个) | 比例 (%) | 均值 | 标准差 |
|--------------|----------|--------|--------|---------|-------|
| 外出时年龄 | 单位: 岁 | | | 21.88 | 0.24 |
| 外出时婚姻状况 | 未婚 | 210 | 25.61 | | |
| | 已婚 | 610 | 74.39 | | |
| 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454 | 55.00 | | |
| | 高中及以上 | 364 | 44.50 | | |
| 有无职业技能证书 | 没有 | 613 | 75.12 | | |
| | 有 | 203 | 24.88 | | |
| 收入 | 单位: 元 | | | 1776.63 | 30.02 |
| 务农经历 | 无 | 365 | 44.51 | | |
| | 有 | 455 | 55.49 | | |
| 出生组 | 1979年及以前 | 304 | 37.07 | | |
| | 1980年及以后 | 516 | 62.93 | | |
| 年龄 | 单位: 岁 | | | 29.79 | 0.33 |
| 是否省内务工 | 否 | 500 | 60.98 | | |
| | 是 | 320 | 39.02 | | |
| 打工地 | 重庆 | 413 | 50.37 | | |
| | 广东 | 407 | 49.63 | | |
| 农村合作医疗 | 没参加 | 411 | 50.12 | | |
| | 参加 | 409 | 49.88 | | |
| 是否有子女 | 无 | 441 | 53.78 | | |
| | 有 | 379 | 46.22 | | |
| 直系亲属是否有人在家务农 | 无 | 71 | 8.66 | | |
| | 有 | 749 | 91.34 | | |
| 配偶是否一同外出 | 否 | 522 | 63.66 | | |
| | 是 | 298 | 36.34 | | |
| 子女是否在打工地上学 | 否 | 711 | 86.71 | | |
| | 是 | 109 | 13.29 | | |

5. 研究设计

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进行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系列回归模型进行比较。

基准模型: 只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 $Y = \beta_{\text{控制变量}} X_{\text{控制变量}}$, 模型中的 Y (因变量) 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X_{\text{控制变量}}$ 为研究过程中的控制变量, 这里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和是否熟悉当地语言, $\beta_{\text{控制变量}}$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完全模型: 加入所有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Y = \beta_{\text{控制变量}} X_{\text{控制变量}} + \beta_{\text{自变量}} X_{\text{自变量}}$, 本研究中自变量为外出时年龄、外出时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是否有职业技能证书、收入、是否有务农经历、个人年龄、出生组、是否省内务工、打工地、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是否有孩子、家中是否有人务农、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子女是否在打工地上学。

嵌套模型: 在基准模型和完全模型之间分别依次加入生命的时间性、个人能动性、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和相互联系的生活因素的模型。

三、影响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回归分析

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比较模型2和模型1可以发现, 在仅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1)中, $Pseudo R^2$ 的值为0.0141, 加入时间因素后, $Pseudo R^2$ 由0.0141提高到0.0336, 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从时间性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来看, 外出时的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 外出时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 已婚者留城几率是未婚者的2.04倍 [$\exp(0.714) = 2.04$], 而外出时的年龄对其留城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 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回归模型 (logistic 模型)

|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
|----------|-----------------|----------------------|----------------------|----------------------|----------------------|----------------------|
| 控制变量 | 性别 (男=1) | -0.543*** (-3.79) | -0.485*** (-3.29) | -0.505** (-3.21) | -0.408* (-2.52) | -0.381* (-2.30) |
| | 语言 (会说=1) | 0.156 (1.06) | 0.231 (1.53) | 0.290 (1.86) | 0.516** (2.59) | 0.532** (2.66) |
| 时间性 | 外出时年龄 | | -0.00678 (-0.42) | -0.00473 (-0.28) | 0.00450 (0.21) | -0.00452 (-0.20) |
| | 外出时婚姻状况 (已婚=1) | | 0.714** (2.89) | 0.385 (1.45) | 0.342 (1.20) | 0.176 (0.58) |
| 个人能动性 |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1) | | | 0.471** (2.74) | 0.457* (2.52) | 0.432* (2.36) |
| | 职业技能证书 (有=1) | | | 0.0072 (0.04) | 0.0073 (0.04) | -0.0195 (-0.10) |
| | 收入 | | | 0.000193* (2.02) | 0.000328** (3.19) | 0.000337** (3.24) |
| | 是否有务农经历 (有=1) | | | -0.566*** (-3.51) | -0.387* (-2.29) | -0.405* (-2.38) |
| 一定时空中的生活 | 年龄 | | | | 0.013 (0.53) | 0.009 (0.36) |
| | 出生组 (1980年以后=1) | | | | 3.272** (2.80) | 2.889* (2.14) |
| | 年龄 * 出生组 | | | | 0.122** (3.19) | 0.109* (2.52) |
| | 是否省内务工 (是=1) | | | | -0.161 (-0.87) | -0.161 (-0.86) |
| | 务工地 (重庆=1) | | | | 0.111 (0.59) | 0.089 (0.45) |
| | 是否参加合作医疗 (是=1) | | | | -0.773*** (-4.50) | -0.733*** (-4.22) |
| 相互联系的生活 | 是否有孩子 (有=1) | | | | | -0.271 (-0.84) |
| | 家中是否有人务农 (有=1) | | | | | 0.157 (0.55) |
| | 配偶是否一同外出 (是=1) | | | | | -0.044 (-0.19) |
| | 孩子是否在本地上学 (是=1) | | | | | 0.646* (2.47) |
| | N | 808 | 794 | 780 | 780 | 780 |
| | Pseudo R2 | 0.0141 | 0.0336 | 0.0636 | 0.0990 | 0.1052 |
| | Prob > chi2 | 0.0004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模型3加入个人能动性因素,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时间性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后,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有务农经历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水平都有显著影响。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农民工的留城几率比高中以下的要高60.2% [$\exp(0.471) = 1.602$];收入水平对留城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留城意愿越强;另外,是否有务农经历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务农经历的人比无务农经历的人留城几率要低43.2%。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个人能动性因素后,外出时的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变得不明显。

模型4加入一定时空中的生活这一因素,加入这一因素后,模型解释力大为提高,Pseudo R2由0.0636提高到0.0990。这一模型表明,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个人的努力差异以及社会时间因素后,时空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模型4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年龄以及消除

年龄与出生组的交互效应后，出生组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效应显示为负，表明位于较前出生组的人留城意愿比位于较后出生组的人留城意愿要弱，他们更倾向于返乡，1980年后出生组的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留城意愿的26.36倍；农民工是否在家乡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对其留城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者留城意愿比未参加者要弱。

模型5加入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这一因素，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及前面三个因素后，与外出务工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只有子女随同在打工地上学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增强作用。有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比无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强，前者是后者的1.91倍，而配偶和其他直系亲属对其留城意愿都无显著影响。

从这一完全模型可以看出，在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性别，女性比男性留城意愿要强；语言，是否会说当地话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留城；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留城；务农经历对留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出生组越往后，越倾向于留城；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者比未参加者返乡意愿要强；有子女在当地上学的农民工留城意愿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通过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留城意愿的生命历程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随着流动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愿意将城市作为其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暂时寄居地，而是希望能够在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许多影响其最终是否能够留居城市的障碍性因素。

第二，在个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因素中，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留城意愿，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农工具备了一定的从事城市中某些职业的技能，职业的获得及职业层次对个体来讲有直接的经济效应，同时职业也是个体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自己在城市中的预期收益的估计也会比较高，同时，教育程度对个体而言还意味着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也会增强其留居城市的信心。

第三，在时空因素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中，出生组效应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即出生年代越晚的人，其留城意愿越强。数据显示，倾向返乡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7岁，倾向留城的平均年龄为27.8岁。具体来看，1985年后出生的这两组农民工留城意愿最强，可能的原因是这两组人以未婚者居多，即使已婚，已经生育子女的还比较少，同时父母年龄也不大，没有抚养孩子与赡养老人的负担。中间四组的留城意愿较前两组有明显降低，有留城意愿的比例均比前两组减少20%以上，这部分人由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般都已结婚并有了子女，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处于上学时期，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及城市教学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封闭，他们一般会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同时，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父母大都已经年迈，需要照顾，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一般会倾向于返乡。留城意愿最弱的为1965年前的出生组，他们的留城意愿不足1985年后出生组的一半，这可能与这些务工者年龄增加，体力下降，收入降低，在城市中所得收入不足以支撑个人或家庭生活有关。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处于技术含量比较低、可替代性较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年龄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一些刚性支出都需要以货币形式进行支付，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支出相当或收入低于支出时，便会倾向于返回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养老；另外这也和中国传统的“叶落归根”思想有关。

第四，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会降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78.15%的农民工外出第一动机是为了挣钱，只有32.5%的人表示在家乡和打工城市收入一样时仍然会外出打工。

这表明，经济动机还是大多数人外出的主要动机，去除了这一因素后，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如果农村的各种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民在家乡的生活压力得以减轻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选择返乡，这从参加合作医疗促使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增强增强可以看出来。

第五，在影响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决策时，子女因素成为家庭决策的重要依据。模型显示，在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家庭成员情况中，仅有子女一同外出在打工地上学这一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子女一同外出比配偶一同外出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作用要大得多，模型中，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对留城还是返乡意愿的影响不明显，这说明当一个家庭有了子女以后，整个家庭重心便会下移，子女的发展与前途成为家庭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决定带子女到打工地上学一定是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的：一是经济条件允许，能够支付其子女在城市上学和生活的费用；二是家庭式迁移，一般夫妻双方都在同一城市，子女有人照顾；三是所在城市具有外来人员子女读书的场所。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农民工也就有了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和留居的动机，因而，子女随迁对于农民工留居城市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分析结果来看，还有一些纳入模型的其他因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时间性因素中的外出时年龄、外出时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可见，决定是否留居城市更多地取决于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状况，而非进入城市时的个体特征。作为人力资本标志之一的职业技能证书对留城意愿也无显著影响。在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很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外来人员是否留居城市与其是否属于省内务工相关性不大。务工地对农民工的留居意愿也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在目前，各个城市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或社会环境并无太大差异，城市间的差异不足以对农民工留城意愿造成影响。配偶是否一同外出在本研究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仅有夫妻两个人外出务工的这种流动方式对农民工是否留居城市还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还有与其关系亲密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留在家乡，有限的收入让他们又无力带其他家庭成员一同外出从而无法留居城市，这一点在处于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外出务工夫妻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2. 政策建议

对于农民工个体来说，在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既定的情况下，个人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通过个人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来实现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有碍社会公正实现的制度因素。破除对农民工不公的制度壁垒，并采取一些切实的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竞争力、帮助其融入城市的措施，使具有留城意愿的农民工能够顺利地留在城市，并且让那些因为客观障碍不得不选择返乡的这部分人也有留城的机会。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当地政府和农民工所在企业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入。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同时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劳动力可以为城市政府实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优质劳动力资源保障。

第二，当地政府在进行教育制度的设计时应该将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加以考虑。研究表明，子女在城市中上学对提升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许多农民工之所以不得不选择返乡，都是因为子女教育问题无法解决。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提供接受教育机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农民工更好地留居城市，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起点公平，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和社会地位固化的累加效应。

第三，建立和完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鉴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意愿的影响巨大，建立一种能够突破以城乡和地域为界限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制度的设计要使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自由地决定是留城还是返乡，而不能让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农民工被迫返乡的助推力。

第四，重视县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县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调查表明，在有返乡意愿的人中，有60%以上的人希望返回县城而不是农村。县城具备农村没有的生活方面的便利，相对

于农村有着良好的教育资源,因为子女教育而移居县城的农村人越来越多,同时县城又不像大城市生活节奏那么快、压力那么大,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县城的宜居性要高于大城市。研究还表明,会说当地话的农民工比不会说当地话的农民工留城意愿要高出 70.2% [$\exp(0.532) = 1.702$],这充分说明文化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重要影响,而县城正是能提供相同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县城就业,可以免去农民工文化和心理适应的艰难,而这两方面的适应被认为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最高层次,也是最难以达到的层次。

参考文献:

- [1] 李强,龙文进.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2).
- [2] 熊波,石人炳. 理性选择与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9, (4).
- [3] 王毅杰.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 (5).
- [4] 李楠. 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6).
- [5] 蔡禾,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7, (6).
- [6] 蔡玲,徐楚桥.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9, (1).
- [7] 尉建文,张网成.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08 (1).
- [8] Elder, G. H., M. K. Johnson, C. Rober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M].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
- [9] 包蕾萍.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5, (4).
- [10] 同 [9].
- [11] 李强.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J]. 社会学研究, 1999, (6).
- [12] 同 [11].

[责任编辑 冯 乐]



(上接第 56 页)

到社会关系和政治文明建设程度的制约。本研究发现,四成以上居民认为“缺乏法律政策的有效保护”是影响女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正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辑出版的《2006~2007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法律政策在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确实还存在不少差距。而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是当前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的重点。因此,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对社会性别的认知程度;还需要增强性别意识教育,在发挥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让男性更充分地认识和肯定女性的价值,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更需要政府进一步提高涉及女性参政议政、劳动就业、财产权利以及婚姻家庭保障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明确执法主体和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律政策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实现男女平等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谭琳. 2006~2007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M]. //Maggie Humm. Modern Feminis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2.
- [3]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J]. 妇女研究论丛, 1997, (1).
- [4] 刘东发. 浅析“社会性别意识”观与“男女平等”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3, (3).
- [5] 杨琳. 中国当代女性发展与社会性别意识 [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3).
- [6] 陶春芳.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全国卷一)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3.
- [7] 许改玲. 当代妇女地位的理论研究 [A].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8.
- [8] 石红梅,叶文振,刘建华.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J]. 人口学刊, 2003, (2).
- [9] 同 [4].
- [10] 梁华林.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8, (3).

[责任编辑 冯 乐]